

## 自序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全书约六十万字,是我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写成的一本通俗性历史读物,目的是在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此书先在台湾的《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逐日登载,连载完毕后即由台北的四季文化出版公司印行单行本。一九八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将它在内地发行影印本。时隔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打算以简体字重新排印,以便能以全新的面貌与内地读者见面。此一盛意,对我自是莫大的鼓舞与激励。感谢之余,谨在此略述缘起,以当序言。

历史是人事活动的积累,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的领导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行,更直接与国家命运的休戚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晚清中国,正当西方势力剧烈冲击,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咸丰、同治之间,内则有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回之乱,外则有英法联军之入侵,当时不但东南半壁糜烂不堪,即是广大的华北平原及西北、西南腹地,亦复萑苻遍地,民不聊生。此时幸有恭亲王奕訢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主持于内,曾、胡、左、李等一班督抚将帅效命于外,同心匡济,竭力撑拄,卒能内靖大难,外拒强敌,弼成同治、光绪之间的小康局面。这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于至危垂绝之时,他们的功勋,必将在历史上永著声光。但不幸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物接连发生重大变故,咸丰不寿,同治夭亡,慈安暴崩,光绪懦弱,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只造成了慈禧太后以一介女流而独揽国家政柄数十年之久的机会。由于慈禧之好把持权力及报复恩怨,遂致光绪中叶以后的政局出现空前的颠倒错谬,此后并因其迷信义和团的神力可以扶清灭洋而招致八

国联军入侵，中国几乎因此而亡国。看了这种兴衰变化与贤不肖人物之进退情形，怎不令我们瞿然领悟人事因素对历史影响之大。所以，要知道晚清中国的历史何以如此灾晦否塞，国事蜩螗，透过当时国家领导人物的言行思想去探索其中内情，应该也是可行的方法。由于此一构想，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打算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庶几可为以通史体裁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补充读物，以增进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之了解。一九七六年夏天，《青年日报·新文艺》副刊的主编胡秀先生约我写稿，我向他提出此一计划，得其同意，于是我就以两年半的时间，陆续写成曾国藩等廿二人的传记，合共十四篇，集结在一起的总书名，就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回首前尘，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瞿鸿禨、盛宣怀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坊间所刊行的中国近代史，佳作如林。但这些通史体裁的史著因其体裁所限，其叙述总是全面性的，对于当时主政人物的言行思想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往往因写作体例之限制而无法着墨，因此也使人难以窥见历史演变之契机与其中曲折。学术著作总是不容易引起读者之阅读兴趣的。本书之作，旨在以说故事、谈掌故的方式来补充学术性史著之缺略，从而引起读者深入了解历史演变之兴趣。至于我的此一努力是否能达到目标，当然得看我的写作能力与取材范围是否适当了。自愧才疏学浅，深恐难以满足读者之期许。不逮之处，尚祈广大的读者不吝指正，是为至盼。

苏同炳 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台湾南港

# 目 录

|                |     |
|----------------|-----|
| 自序 .....       | 001 |
| 曾国藩 .....      | 001 |
| 胡林翼 .....      | 022 |
| 左宗棠 .....      | 045 |
| 张之洞 .....      | 073 |
| 刘铭传 .....      | 105 |
| 咸丰、慈禧与恭王 ..... | 126 |
| 李鸿章 .....      | 175 |
| 翁同龢 .....      | 216 |
| 同治与光绪 .....    | 255 |
| 大小醇王 .....     | 294 |
| 端王、刚毅与荣禄 ..... | 337 |
| 袁世凯与庆亲王 .....  | 377 |
| 瞿鸿禨与岑春煊 .....  | 445 |
| 盛宣怀 .....      | 478 |
| 参考书目 .....     | 513 |



曾国藩(1811—1872)是一位崇尚经世致用的学者,他编练湘军,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要功臣,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在同治、光绪年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景象。

## 曾 国 藩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假如没有曾国藩出来力任艰巨,则太平天国之乱事必难平定,清皇朝的命运,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会提早五十年结束。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这一个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国,自中国以至外国,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几乎无不深致钦仰景佩之诚。唯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运动蜂起之时,革命党人对他所加的苛刻评论。

勃兴于清末的革命运动,首先揭橥其排满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基于此一

革命主张,为满族所建立的清皇朝当然是必需推翻的革命对象。至于那些在清皇朝中做官的汉人,如果他们曾经出力镇压过汉人的革命运动,亦必被视为替异族效劳的功狗,诋之为汉奸,斥之为民贼。曾国藩生当清代末年,适逢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之会,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出力最多的人,于是也就不免被诟为帮助清政府镇压汉人革命的刽子手,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画成人首兽身的畜类,口诛笔伐,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实在说来,自明朝亡国,经过清皇朝一百多年来的高压统治与怀柔收买,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经泯灭无存。曾国藩生当此一时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范畴之内——除了忠君爱国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砺品德,进修学问,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为社会民生谋求福祉。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在他的家书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来。《曾国藩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这正是中国的标准儒家思想——只有以社会民生为重的天下思想,而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责备曾国藩何以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不知赞助革命,以便乘机恢复汉人的政权,反而要为清皇朝出力镇压此一民族革命运动,就未免昧于时代环境,对曾国藩持论过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后,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论家、历史学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观点对曾国藩重作新的评价。以新的观点来看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便会觉得,曾国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与功业,也依然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成其伟大,只有在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来。

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践履。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业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除此之外,则他的命运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也曾有过重大的关系。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庵杂识》中有一条说:

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摺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所谓“不信书,信运气”之说,并非空言泛论,而确实系有感而发之言。试综观曾国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话,即使他终生砥砺品德,笃实践履,始终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兢兢自守的君子,决不能在国家民族面临极大危难的重要关头让他出来领袖群伦,创下如此惊天动地的不朽大业。凡此

种种,在他的一生传记之中,都有明显的事迹可以稽考,不能斥之为无稽谰言。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家世代业农,到他父亲麟书时,方才因读书而成为县学中的一名“生员”——秀才。曾国藩在六岁时开始从师入学,十四岁开始到长沙省城应童子试,先后考过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国藩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方才入学成为生员。翌年,领乡荐,中式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国藩二十八岁的那一年,会试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照一般情形来说,读书人能够在一连串的科举考试中先后得捷,已经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踌躇满志的了。但若就事实而言,则又不尽然。因为在进士之上,还有更高一层,即俗语所说的“点翰林”。中了进士,不一定能做大官;点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备了做大官的资格——不但是资格好,而且升迁也快。但点翰林必须进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进士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榜发之后即授职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立刻成为名实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进士要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教习三年,期满后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正式成为翰林院中的一员,其或改官部属,或授职知县,从此与翰林绝缘。而进士参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为多,三甲者寥寥无几。所以,曾国藩如果不是运气好,他在中了三甲进士之后就很难被点为庶吉士。点不了庶吉士,当然更成不了翰林,这对于他以后的官职升迁,影响就大了。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就这样,曾国藩才幸运地被点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职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曾国藩能够先中进士再成翰林,对于他的一生事业前途,关系甚大。《曾国藩家书》卷二,载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书》,云: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岂不丑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所谓“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还远得很。由他所说“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误人终身多矣”的话,可以知道曾国藩假如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之中奋斗挣扎,决无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以为他日救时匡难之用。这是他自己所说“不信书,信运气”的第一步征验。至于第二步的征验,则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检讨之后的历次考试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谓不定时举行的“大考”,到时由皇帝命题考试诗文策论,以为升迁降黜的依据。大考成绩好的,升迁特别快,否则立予降黜,绝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语,有所谓“秀才怕岁考,翰林怕大考”的话,正是针对那些侥幸得售而不肯努力上进的读书人而说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来用功不懈,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不过七年的功夫,就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直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具备了他此后出当大任的官阶与资格。若非命运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机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叙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二等第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翰林院的侍讲与侍读,秩从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秩从四品;至于内阁学士,则从二品。清代官制,满汉并用。翰林院官的升迁途径有二,一是考试,二是考绩,而考试成绩优良者,较考绩的升迁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与外官,则升迁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绩。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参加考绩,须先占得实缺。而进士出身以部属官及知县用者,往往数年不能补得一官。既不能补官,自更不能由考绩升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进士,由于翰林与非翰林及大考成绩优劣不同的关系,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菀枯各异,云泥有别。如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后的第二年,还不过只是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年之后就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二年后又升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又过二年,就再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像这样每隔二三年就超升一二阶的情形,在翰林中虽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员,升迁较京官更难,自更不能有这么好的运道了。他不必论,即以同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

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的二甲进士,科第要比曾国藩早二年,名次也比曾国藩高。朝考入选之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十九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在这一段经历上,他的资格与成绩和曾国藩一样。只是他在道光二十年的江南乡试副主考任内出了毛病,被降一级外调,从此蹭蹬仕途,直到咸丰三年,曾国藩已经做到了正二品的侍郎,胡林翼还在贵州黎平府做从四品的知府。后来虽然由于胡林翼自己的干练,声誉日起,也还需要曾国藩的全力推荐,才能使他有机会到湖北战场上去大展身手,由按察使、布政使,而一直升到巡抚,官位与曾国藩相等。在这一段经

历史上,胡林翼的升迁,足足比曾国藩迟了七年。而论到出身,胡林翼还是曾国藩的翰林前辈呢!曾国藩的宦途得意,对于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及清皇朝的存亡,关系甚大。假如曾国藩在咸丰初年还只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纵使他有通天的本领,他也没有出头的机会。又假如曾国藩与胡林翼一样,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中级官员,那也轮不到由他出来领导群伦,成就他此后的回天事业。所以说,曾国藩能够在太平天国崛起之后,以一个在籍的侍郎出来组织湘军,夷平大难,其中实在杂有很多机缘凑合的因素。曾国藩平生,不信书而信运气,在这里就有了很明显的征验。至于他之能够在翰林院中读书进修,当然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了。明清时代的翰林院,乃是新科进士“读书养望”的好地方。能够进得了翰林院的进士,既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翰林院中的丰富典籍,尽量在经史、文学、政经、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曾国藩家书》卷二,收有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致弟书》,云:

兄少年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窃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所谓“范、韩”,即宋朝有名的贤相范仲淹与韩琦;所谓“马迁、韩愈”,则是有名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与古文名家韩愈。由此可知,曾国藩在未进翰林院之前,不但对学问之道未得门径,而且卑无大志,只是一个碌碌庸庸的陋儒而已。而在他中进士做翰林之后,日与良朋益友相往还,于是方得窥学问之门径,而有志于圣贤之学。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谱》,亦说:

公少时器宇卓犖,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纪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章。

由此可知,曾国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与学问,都是在此时奠定其基础的。所以然之故,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得有良好的读书环境,二方面亦因得有良朋益友的切磋。他在此一时期内所交的朋友,计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垵、邵懿辰、陈源兗等,逐日相与讨论问难,得益极多。至于他在治学方法上的导师,则是时任太常寺卿的唐鉴。由于唐鉴邃于义理之学,亦即《宋史》所谓之道学,曾国藩常向请益,遂以朱子之《近思录》及濂洛关闽诸子之书为日课,肆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尤大。曾国藩后来从事于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中的陶镕范



铸。至于他在做翰林时期内因致力于经世实用之学而对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实用方面的学问都大有所得,而在此后的对太平天国之战中发挥其实用,更是有目共睹之事,不必多所赘述。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鏞,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鏞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所以他实际上乃是道光皇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之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太平天国之乱,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民生凋敝,灾变相乘,而贪污官吏之侵渔迫害,亦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等到太平天国军在广西起事之后,清政府调兵遣将,竭力企图将之迅速扑灭。不料兵不能战,官不能守,前方传来的军报,但见溃败相继,多年训练的几十万大军,竟然抵敌不了一些初起的草茅之寇!道光皇帝这时恰好在危疑震撼的动乱时代中崩了驾,咸丰皇帝继位,派大学士赛尚阿到广西去督师,也仍然阻遏不了太平军的燎原之势。曾国藩这时已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谓:“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接着他提出激励振作之法,“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在这一道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人才之何以消沉汨没,有其透彻的认识,而对于人才之培养作育,更有其独到之看法。

其余各疏,如《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对于当前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等切要的问题,也都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前的时弊,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此疏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重视。

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所指出的皇帝“圣德”，一是敬慎。谓皇帝每当祭祀之时，“对越肃雍，跼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琐碎之弊，在见小而遗大，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计之远者大者，反略而不问。“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赜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弘济于艰难者。”这对于当时自皇帝以至宰相百僚之避重就轻，涂饰细行，以求容悦取宠的作风，不啻是无情的棒喝，可谓痛切之至。至于皇帝的第二样“圣德”，则是好古。谓皇帝于“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文饰之弊，在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诗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诗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道光咸丰以来的所谓“人才”如此，如之何不使政风败坏，盗贼纵横呢？至于曾国藩疏中的第三项“圣德”，则是“广大”。谓皇帝“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广大之弊，在自以为公正开明而不自知已蹈拒谏饰非之误。以致“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予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曾国藩之风骨劲棱，在这里也就充分可以看出他之不同凡响。

曾国藩在他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但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不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

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是清楚明白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其伟大不朽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此,谓: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蔭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太平天国乱事之平,在这里已经伏下了契机。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

清咸丰二年三月,赛尚阿在广西讨剿太平军失利,大股太平军由永安扑攻桂林,旋陷全州,由此入湖南省境,大掠民船,将浮湘江而北出长江。其时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得家中讣闻,知生母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病逝,立即改服奔丧,由黄梅县渡江至九江,雇船至湖南。尚未到达长沙,得知太平军已至长沙城外,遂由岳州取道湘阴抵家。其年十月,太平军以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去,陷岳州,陷汉阳,从此日见其燎原莫救。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湖南巡抚张亮基奉到皇帝的上谕,云: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

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由于皇帝的这一道上谕,曾国藩就以丁忧在籍的侍郎身份在湖南开始办起团练来了。这以后的事情,就是他以所训练的本地乡兵——湘军,东征鄂赣皖苏诸省,转战十年,终于底定全局的往事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清史》曾国藩本传及《曾国藩年谱》等书记述甚详,可以不需在此复述,以免浪费篇幅。值得在这里加以讨论的,倒是曾国藩所赖以成功的练兵方法,与他那种不畏困难、不避艰危、努力坚持到底,终于克成大功的强毅精神。

咸丰皇帝在咸丰四年降旨命曾国藩在籍办理团练,这并不是湖南所特有的事。自太平天国事起,大江南北的十数个省份都先后被兵,政府的经制官兵——绿营兵征讨无功,战祸迁延不解,各地的土寇盗匪亦乘机蜂起。为了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于是各省都先后办理了团练——训练本地的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本地的治安。但各省所办的团练虽多,却只有湖南一省所办的成绩特别好;不仅如此,经由曾国藩所创办的湖南乡勇——湘军,最后并且成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力部队,这其中的差别所在,便与主事者的练兵方法有密切关系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可以先看看清人王定安所撰《湘军记·水陆营制篇》中对清代经制官兵的批评:

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岁糜二千万金。遇寇发,征调四出,率用本辖营并

统之。其部卒众寡不齐,少或百人,多至千余人,绾以提督镇将,而皆隶于专征之钦差、将军、都统、督抚。将不必由帅选,一营士卒,视调发多少无定额。二百年来,行之久矣。自洪杨倡乱,大吏不习兵,绿营<sup>些</sup>窳骄惰,闻羽檄征调,则举室惊号,以为趋死地无生还理。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钦差疆帅复时相齟齬,号令歧出,褊裨各分畛域。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

绿营官兵不能用于作战,《曾国藩书札》中亦言之。如《书札》卷四《致李少荃书》曰:

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此种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

绿营兵之所以不能战,不但由于战力薄弱,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毫无团结之心。曾国藩目击绿营之弊在此,所以他心目中的军队,一方面固然要战斗力强韧,二方面更需团结一心,万众一志。他在写给王璞山的信中说:

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补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sup>刺</sup>,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如之何而可以使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呢?由将领而言,是需要他们也与曾国藩自己一样地具有服务桑梓,救民水火的仁爱精神与爱国情操。具备这些条件而兼有治军作战之才,斯为将才之选。《曾国藩书札》卷三,《与曾香海彭筱房书》云: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由士兵而言,则需要为将领之人视之如子弟,感之以恩信,如此必可使上下之间感情融洽,亲如家人。这在《曾国藩日记》及《书札》中亦屡屡言之。如《日记》己未八月三日云: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又,《书札》卷十七,《与朱云崖书》云:

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

士气民心高旺如此,可以知道这必然是一支战必胜而攻必克的好部队。然而其成功的契机则完全属于人为之因素。这都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进去之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实应归功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学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

曾国藩虽然成功地创立了湘军,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王闿运撰《湘军志》,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意思说曾国藩虽然以戒慎戒惧的心情领导湘军从事训练及作战,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些话确是事实。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所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指挥官时的成绩。如咸丰四年四月靖港之败,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以及咸丰十年六月祁门之困等,皆是。只因他知人善任及善于识拔人才,遂能弥补他这方面的缺失而有余。薛福成《庸庵文集》中载有他代替李鸿章所撰的《奏陈督臣忠勤事实疏》,在缕陈曾国藩的生平事功外,曾说: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

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真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

曰“未易以悉数”，当然是为数甚多，这话不错。湘军将士及幕僚人才之中，由于曾国藩之拔擢，后来寢假而成为封疆大吏及专阬大帅者，多至难以悉数，前述塔、罗、李、王、杨、彭等人，不过是最著名的而已。其他如李鸿章自己，亦出自曾国藩的幕府，因曾国藩之保荐而出任江苏巡抚，最后其勋业与名位且与曾国藩相埒，即是最显著的事例。这篇文章由薛福成代笔而以李鸿章的名义出奏，以这二人与曾国藩关系之深，经由他们所说出来的这一番话，自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而曾国藩在太平军作战的军事贡献方面，除此之外，尚有更重要的两点。其一是他在湘军训练规制等方面的擘画经营，其二是他对于当前作战情势的正确判断，都是值得特别推崇的。

湘军之兴，是由于曾国藩深切了解绿营军队兵将不相习，及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等积弊，所以要以招募乡农加以训练的办法来代替不可用的绿营兵。他所规定的湘军营制，大致仿效明朝平倭名将戚继光的成法，募兵必须挑选朴实诚笃的乡农，不用市井浮滑之人。凡大帅欲新立一军，则先拣定统领数人，檄令自行招募若干营。其营官即由统领挑选，一营以五百人为额，营分四哨，哨官由营官挑补。哨辖八队，每队十人，其队长亦即由哨官挑补。在这种制度之下，勇丁由队长挑选，队长由哨官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兵由将招，彼此之间都有着同乡同里或相同的宗族关系，自必能团结一致，乐于接受其主将之领导统驭，临敌争先，虽死不相弃。他所定的营规，一是重纪律，二是培养士兵的良好人格，三是严训练，四是熟技艺，其办法简单扼要而切实有效。经由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言忠勇则慷慨赴战，矢死靡他，其英风浩气，迥非寻常意度可及。言勤俭，则士兵于战守之余暇尚且利用时间养猪种菜，一方面增加收入，二方面不脱乡间农夫的本色。言朴诚，则菲衣恶食，屏绝浮华，但讲实际而不事虚文。古来名将之治军，大都只做到精操练，明节制，倡勇敢等等能事而已；很少能像曾国藩那样，既把士兵训练成一个善战的勇士，更把他们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这些方面而言，曾国藩的成就，就足以超越常人了。

以上所说，乃是曾国藩在湘军营制、训练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至于他在作战情势方面的正确判断，有时往往足以使卓越的军事大家亦自叹弗如。例如他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所部署的战略原则，就是十分令人心折的。

清文宗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法，由宁国广德疾趋浙西，突然攻占了清军江南大营的后路粮饷重地杭州，江南大营的督师钦差大臣和春急命提督张玉良分兵前往救援。甫抵杭州，李秀成已以全师取道湖州，迅速攻抵江南大营的后路。此时南京城中的太平军亦以全力出兵夹击，在东西夹攻之下，



江南大营顿时崩溃,围困南京数年的三百余营清兵,全部瓦解,苏常精华之地亦尽皆失陷于太平军之手,战局顿时逆转。曾国藩于此时奉皇帝之命,受任为两江总督,责令务必不避艰险,迅速前进,以收复失陷地方,重整军威。于是,曾国藩奏上《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一折,提出了他对挽回局势的全面战略部署。他说:

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源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自从曾国藩受任为两江总督,奉命总统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之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帅一职,就开始落在他的头上。而他从这一时期起,着着展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实行全面围堵防剿的大包围战略,即是此一奏疏之引申。他能够在受任主帅之初,便确定了全面围剿的战略原则,已经很不容易。而太平天国方面的领军主帅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二人亦非弱者,他们在知悉了曾国藩所部署的此一战略原则之后,立即采取大规模的迂回进击,以求打破曾国藩策划的战略部署。于是,一方面是力求保持合围形势之完整,一方面则力求牵制突破,自咸丰十年至十一年,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太平军凭借了他们的人数众多,分路向清兵猛攻,着着获胜。曾国藩身为总制四省军务的主帅,自然有责任及时救援。但成问题的是,曾国藩所赖以向太平天国进攻的湘军兵力,不过只有数万之众,而且大部分都被放在对安庆城的围攻及牵制的位置上。如果安庆之围一撤,分进合围的战略部署立将瓦解;但如不撤安庆之围,对于流突各省的太平军又将如何应付?这就是极大的难题了。也正因为此时的局势,面临祸机四伏的严重关头,何去何从,取舍为难,在这里乃显出了曾国藩的非凡睿智与毅力。

薛福成《庸庵文编·书陈玉成苗沛霖伏诛事》记苏常既陷之后,双方的军事情势云:

苏常诸郡皆陷,于是道员今威毅伯官保曾公以兵万人急围安庆,多公(多隆阿)率万人围桐城御援贼,李勇毅公续宜以万人驻青草壩为两军援,鲍公(鲍超)以万人为游军,东西驰剿,水师将杨岳斌扼驻滨江要隘,并助守围军内外长濠,集厚力,张远势以待敌。(陈)玉成自江南扫境而至,与多公李公鏖战于挂车河,大败,进薄围军,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乃楚军根本,冲其腹心,必撤围自救。乃从英霍间道入犯湖北,连陷黄州、德安、随州,武汉襄樊皆大震。噤悍酋李世贤黄文金各挟其全部,躡徽饶信三府,李秀成纠贼十余万围抚州,攻建昌,进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庆也。曾公胡公分遣诸军,且防且战,竟

不撤围军。玉成乃分党踞所陷城，自率悍贼东援安庆。多公邀击于高河铺，于挂车河，皆大败之。玉成之党入自集贤关，筑垒菱湖亦冈岭以围我国军。曾公凭濠拒贼，与鲍公军夹击，破贼四垒。贼将刘琰林跳而逸，水师擒磔之。复展外濠，环贼十八垒于围内，俘斩无脱者。琰林，玉成部下骁将也。既失之，军势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贼益纵，玉成复率杨辅清等三伪王分援安庆桐城，昼夜疾斗，屡进屡北，贼众崩溃。其江西贼则左文襄（左宗棠）公以一军突起，鲍公亦以全军驰往。连与贼遇，大败之于乐平，于景德镇，于丰城，于河口。群贼失势东遁，官军遂拔安庆桐城，徇濒江郡县，皆下之。

这一段文字，概述咸丰十、十一年之间，太平军与清军两方为解安庆之围及坚围不去而激烈进行的包围与反包围战，虽称简明扼要，而对于当时曾国藩自己所处的情势如何，则并未述及，仍须参看薛福成代李鸿章所拟的《奏陈督臣忠勋事实》一疏中所述的这方面情形，以为补充。薛文叙此，云：

当此之时，贼势如飘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无完土，苏皖二省，糜烂尤甚。曾国藩于无可筹措之时，多方布置，奏荐左宗棠襄助军务，募勇湖南，征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澧于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自率所部万人，驰入祁门。甫接皖防，而徽宁复陷，诸路悍贼，麇集祁门左右，叠进环攻，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示以镇静，激励诸将，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群贼望风授械，丧胆宵遁。自是军威大振，而时局遂有转机矣。

这所云曾国藩“定计不撤安庆之围”，及“自率所部万人，驰入祁门”，就是他在祁门受困的那一段事了。祁门之困，最足看出曾国藩临危不乱与坚忍强毅的性格。江苏巡抚何璟于曾国藩逝世后奏陈其生平功绩，其中曾经述及曾国藩受困祁门时的情形，说：

逮咸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以一战驱贼出岭。

曾国藩以祁门为统帅大营的所在地，本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祁门不但位于群山之中，粮运不便，而且其地形如处釜底，极为不利。曾国藩在此受困而居然不曾被太平军所破，实在是一项奇迹。若说此战之所以终能扭转局势，便是由于曾国藩之坚守不屈，未免迹涉夸张。此时若不是有鲍超一军适时来援，曾国藩的大营是否终能免于太平军的毒手，谁也没有这个把握。于此，我们除了佩服曾国藩坚忍不拔的强

毅精神外,还得再度赞同曾国藩自己所说的话——不信书,信运气。而曾国藩在如此重要的危急存亡关头,不但坚守不屈,而且神定气闲,不改常度,这种迥出寻常的定性与耐力,便不能不使人由衷地敬佩了。

曾国藩在祁门被困,亦正是曾国荃围攻安庆之役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兄弟二人同处危地,彼此悬念,在曾国藩手书记及家信中时常可以看见这方面的记载。由于曾国荃之一再劝请移营以策安全,曾国藩亦觉得必需抽调鲍超一军前往增援安庆方面的围师,因此方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将大营由祁门移驻东流,鲍超一军,亦因之而渡江北调,协助曾国荃攻剿来援安庆的英王陈玉成。鲍超与多隆阿,乃是当时清军中最著名的战将,素有“多龙鲍虎”之称。多隆阿守在庐州牵制陈玉成的行动,已使陈玉成头痛万分,如今再加上这支骁悍鸷猛的“鲍癞狗”,自然更使陈玉成无所施其手足。在遭遇了一连串的败衄之后,陈玉成所部的数十万太平军崩溃瓦解,安庆亦于咸丰十一年八月间为清军所攻克。一场惊心动魄的包围与反包围之战,总算在曾家兄弟坚守战略部署,绝不因情势危急而动摇决心的情况之下,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安庆既克,清军分水陆两途沿长江而下,直抵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开始另一场围攻南京之战。这一场战争的艰险困难,比之围攻安庆之役,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苏巡抚何璟疏中叙此,云:

咸丰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同治元年,水陆两军,並江而下,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其弟国荃统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鸿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频闻。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爨无夫。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昔之劲兵,皆变孱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则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颍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阳寿州苗捻复叛,发贼又由浦江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岌岌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旦溃裂,尽隳全功,援浙救苏保江三者又复兼顾,时危势亟,军情反复,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贼者。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际,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

自安庆克复,及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在浙江江苏二省连获胜捷,曾国荃又在南京城下扎下大营之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三路合围形势,实际上已经完成,太平天国的命运,此时亦已将到达尽头了。但话虽如此,自天王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国大小兵将,并没有人甘心坐以待毙。在太平天国后期名将忠王李秀成的统率之下,仍有战兵数十万可供最后的生死搏斗。于是就出现了何璟疏中所说的情形——李秀成调集了江浙各地的劲兵勇将,大举围攻扎营于雨花台的曾国荃军,历时四十六